



# 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

陈顺馨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 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

陈顺馨 著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新登字(京)15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陈顺馨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2

(北京大学青年学者文库)

ISBN 7-301-02706-0

I. 中… II. 陈… III. ①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②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I206.7

书 名: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

著作责任者:陈顺馨

责任编辑:龚 言

标准书号:ISBN 7-301-02706-0/I·348

出 版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出版部 2502015 发行部 2559712 编辑部 2502032

排 印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24千字

1995年4月第一版 1995年4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9.50元

## 序 一

谢冕

陈顺馨来自香港，到过世界很多地方，她可以有很多的选择，却迷上了燕园。她在这里修完了硕士课程，紧接着又开始博士学位的攻读，她与这所大学有着不可割断的精神纽结。

对于希望超越世俗而在精神上有所追求的人们来说，北大是一个磁场。这磁场吸引着海内外诸多学人，他们可以放弃很多机会而朝圣般来到这里，总为求得人生境界的一次升华。北大对人的启示，可以集中到最简单的一个点上，即人们被告知，尽管人不能离开物质条件而生活，但精神却远不是苍白的：物质的拥有者可能贫乏，而精神的拥有者却可能富有。这里的空气是弥漫着某种庄严感，那种民主精神与真理探求相连结的目标，始终鼓舞着人们前赴后继地奋斗。

陈顺馨就是这样被无形的磁力的吸引而来到了这里。她已经成为北大这环境中理所当然的一员。从做人到治学，她都按照这里提供的条件和标准塑造自己。陈顺馨做人认真，做学问也认真，锲而不舍的执着和投入，使她在学海遨游中获得了显著的成绩。

对于像她这样生长在另一种社会、又受到另一种教育熏陶的人，能够读通中国大陆这本书、特别是能够读通大陆当代文学这本书是非常不易的。海外专攻中国文、史、哲的汉学家虽曰掌握了中文，但真正能够读通当代中国这本书的也并不多。他们多半

从社会政治层面、特别是从意识形态特性的角度去理解和解释这里独特的人文景观，这确有道理，却往往流于世俗的偏见而难于深入。陈顺馨寒窗数载，在燕园苦读的就是这样一本“中国书”。据我观察，她的学习和思考均取得了有异于人的进步。”

中国社会在本世纪下半叶的奇诡多变，对于长期生活在海外的所有人，都会有一种格格不入的陌生感。别说这是一本丰富无比的活书，有的就是一个词、一个概念的领会，也会造成极大的理解的困难，但这本书不管有多么艰深，陈顺馨硬是顽强地读了进去，而且竟然读出了其中的深意，她的确也为此付出了有异于人的努力。

陈顺馨为学的勤苦是突出的，她有一股穷根究底的韧劲。她精通英语，可以通过直接阅读把握学术的最新信息。她的这本著作中关于外国文学理论批评及文学史观念的评价，都具有表达该学科历史沿革及前沿状态的性质。女性主义批评属于新兴学科，国内实践甚少，陈顺馨集数年努力，致力于此而成绩斐然。

她的好处是对理论不浅尝辄止或浮光掠影，而是既然涉及便要把脉络理清，运用时不盲目，且崇尚实际而不务空谈，没有时下流行的浮躁与夸饰的陋习。这从她使用的题目便可看出这一特点，如“女性主义批评与文本解读”，把理论阐释和应用紧密地联系着具体的文本的解读方面。书中论及女性主义批评，多用实例予以比较的分析，如曹禺、赵树理两位男性作家笔下的两极女性；如凌叔华的《酒后》与丁西林改编的《酒后》的分析比较等，均展现这位作者的追求实效而不喧哗的为学风格。

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迄今已接近半个世纪，作为中国新文学的组成部分，独立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也已接近

完备和进入成熟期。当代文学研究的确深入并取得了成效，但近年来逐渐产生了一种倾向，即一般论者热衷于追逐新潮而忘记历史。文章越做越“新”，也越做越飘浮。这倾向构成了总体的失衡。要说新潮，陈顺馨所知可能不比他人少，但她不追求时髦，甚至从热闹场中拔足而起，回到被遗忘的“历史”中去。近年她对“文革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的兴趣，就是这种“逆向而行”的表现。

这种与时尚的逆反是勇气和自信的证明，也是一位学者的坚定性和拥有独立意识的证明。当然，所谓“回到历史”并不是回到惰性或回到标准化的旧路上去，而是以当代人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这是可以而且应该是全新的观照，而断然排斥屈从于历史歧变奴性认同。本书关于十七年文学的论述角度富有新意、叙事话语与性别理论的研究，都体现陈顺馨的“回到历史”是一种新的占有，她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野。

自信和独立是一位学者从幼稚走向成熟的验证。自信而不轻狂，独立而不专断，是我们心向往之的境界。但这绝不意味着平庸折衷。不论求学还是治学，信心总是一种品质。若不自信则学业不会上进，若不自信也谈不上创造。独立意味着充分自主的判断力、论述方式，以及个人风格的形成。独立和创新互为因果，有自己的见解和思考，不照搬他人的结论反过来为创造提供了基础和前提。同样，一位具有创造力的学者，无疑是一位受到强大自信心支持的学者。陈顺馨这本书当然是她学术生涯的起步，但我感到而且也希望她正健康地走向我们大家都向往的大目标。

陈顺馨在这所校园的数年生活，不觉间也染上了这个小社会特有的“呆气”——这是一种难以界定的品质，包括对学术和精

神的专注、对校门外的社会的“无知”等等——她的好处是有很多这样的“呆气”。但她的缺点可能也在这里，即，她太拘谨，扎实和勤勉有余而活泼灵动略嫌不足。这是我在祝贺她的成绩之时而寄望于她的。

1994年7月17日

于北大畅春园

## 序 二

戴锦华

不想以“文如其人”的滥套来为阿馨作序，尽管在阿馨那里，这正是一个事实：她的文字一如她的为人，平实、饱满而深挚。但是这本并不极为丰厚的著作（当然，作为阿馨在大陆求学前四年的收获，它已足够的厚重）之于阿馨，只是她作为治学的一个角隅、一扇窗口罢了。

五年前，阿馨已逾而立之年，由繁华喧闹的香江来到北京，从师于洪子诚、谢冕先生，主修中国当代文学。由此进入了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的领域。这是一个新的领域与开始，也是阿馨的探索与跋涉中的又一句段。早在八十年代初，阿馨曾在欧洲的求学、游历中度过一段少年意气的“国际流浪女”时代，在荷兰的社会研究院获得了发展学的硕士学位。正是在这段求学与游历的岁月中，欧洲激进的学术氛围、女性生存的林林总总，与阿馨自己锐敏而内向的女性体验撞击，唤起了她极为自觉而清醒的女性意识。在她的回忆中，也正是在这段特定的经历中，她成为了一个女性主义者。女性主义之于阿馨，不仅是一种视点，一种学术立场，甚至不仅是一种信念。这与其说是一个标识，不如说是阿馨生命的一部分。一如她的为人，阿馨之为女性主义者，平实自信、坦坦荡荡、不矫情、不张扬，执着坚韧，却从不强加于人。她宽厚、温和，充满了理解与背负的襟怀，但从不退缩、妥协。记得初识阿

馨，是在1990年，我初返母校讲坛之时。课下，阿馨赠给我一册她在香港创办的妇女杂志。杂志的名称令我生疑——《女流》。“女流之辈”，无疑是一种蔑称，一种萎琐低微的女性形象。但当我读过这本杂志，特别是当我和阿馨相交、相知日深之后，我才深切地体味到，这名称作为一本女性主义的杂志，是如此的贴切。这是一种坦荡的性别的自我确认，一种不无颠覆意味的、女性形象的重写。不错，正是一些“女流”，一些为自己的性别而自豪并欢畅的女流，一些反抗男权压迫、反抗性别歧视、崇尚姐妹情谊的女流。凡与阿馨相处、相交过的女性，自会深切地体味到，姐妹情谊在阿馨那里，不仅是一种女性的乌托邦，亦不仅仅是一份理想的倾注，甚至不仅仅是一种自觉的实践；那是一种生存方式，一份无终止的无怨的奉献、无悔的承担。

自欧洲返回香港的岁月中，与其说阿馨在继续她的学术研究，不如说她是在实践着她在求学生涯中确认的社会理论与社会理想。是她和志同道合的女友们首创了香港最重要的妇女组织之一“新妇女协进会”（妇进）。阿馨自1986年起，到她前来北京寻找学习的道路之前，任妇进主席。这是些热情而平实的年轻女人。白天，她们和别人一样，作为记者、社工、教师、编辑或公司职员，为事业、为生计而奔波。入夜，当劳碌了一天的人们涌向繁华香港的娱乐场所、或回到自己的安乐窝时，她们便齐聚在自己租下的简单的办公室里，愉快地开始了她们所倾心的工作。这是不能给阿馨和她的朋友们带来任何收益与“利润”的“第二职业”，相反，阿馨就曾到处奔走为妇进争取必要的经费。这不是任何一种机构化的组织，然而，它却是一个稳定而牢固的团体。对女性命运的共识与关注、对女性理想的执着，使之成立；为这一理想的

热情与奉献使之生存。自 1984 年起，十年间，她们创办了重要的妇女刊物《女流》；关注于香港各界妇女的现状与问题，关注于香港形形色色传媒系统对女性形象的勾勒与表述；她们不时对各类机构与组织提交她们对性别歧视及其表述的抗议，间或前往有关机构抗议、示威，在她们的直接干预与参与下，港府被迫面对有关法律条文中带有性别歧视色彩的条款；她们设立了热线电话，与社会各阶层妇女倾谈；她们亦办讲座、训练班，推行基层教育，并搞调查研究，出版报告；她们建立了全香港最完备的妇女研究与妇女现状的资料中心……其间的种种艰难、坎坷，非个中人无法历说。阿馨则远非历数自己功绩之人。只是当她们刚庆祝建会十周年之后，现任主席的彩云，突然发现了胃癌，胃切去了大半，阿馨谈及此事，轻叹一声，“都是作这个主席，说不出有多累……”。1993 年，在港参加学术会议，时值阿馨返港，引我见了新妇女协进会的中坚们。一群如此活泼、投入而朴素的年轻女人。她们都分别有着成功的事业、或和谐的家庭。我们的话题热烈而多变，由香港、大陆妇女的现状到我和芳子引为“知音”的“硕大银耳环癖”，从女性研究到妇进活动中的趣事；诸如她们前去抗议一家广告公司的充满性别歧视的广告，公司经理答曰：那些广告全是女人制作的。一阵笑叹。她们帮我更深地理解了阿馨，她的内心，她的情怀，她的执着与宽容。

从任何角度上说，阿馨都不“像”一个“妇运领袖”。她总是那样平和、从容、宽厚而宁静，她会如此耐心、聪敏而富于理解地倾听，绝少插话或“宣言”。当她开口时，总是那样简洁、诚挚。只是偶尔略略提高的声调会露出她内心的波澜，但这种情形却绝

少出现。难见她口中臧否人物，对显见的敌意与冲突也只是淡然一笑。在北大的校园里，她似乎极为和谐地成为众多勤奋的研究生中的一个：朴素的衣着，简单的双肩背，一辆自行车，匆匆地往返在图书馆、教室和宿舍之间。她最初抱着体验大陆生活和学习中文的愿望来到北京，很快便为文学理论、当代文学与学术研究所吸引，立刻以阿馨式的投入进入了这一新的领域。而她的硕士导师洪子诚先生的人格、学品令她敬佩，她愿意像他那样投入于这寂寞但有意义的事业。间或与阿馨谈起这些，除了北大特定的学术氛围，师长人格学术的魅力，另一个深刻的原因，也是我们间的共识是，女性主义不应仅仅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与社会运动，就其本质而言，女性解放的现实必然伴之以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不仅是对不平等的社会现实的抗议与改变，而且是对深刻内在于文化之中的男权文化的揭示、解构与重写。只有改变以歧视、甚至无视人类的一半为前提的文化性别等级，才有可能彻底解脱“解放妇女”、“新女性”作为“占领区的平民”、“解放了黑奴”的历史命运。

然而，这是一个艰难的使命，一次历史的、针对历史的挑战。女性主义的学者和女性主义的作家一样，面临着女性写作的多重挑战与困境。必需一次再次地完成女性的“文化镜城”的突围；在反抗施之于女性的重重规范的同时，避免遭遇到在逃脱中落网的文化命运。与此同时，一如女性主义理论家、女性实验电影导演劳拉·莫尔维所指出的：“我们无法在男性的苍穹下另觅天空。”于是，一个女性主义的写作者，在批判“菲勒斯（phallus）中心主义”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同时，还必需面对着与男性写作者共同使用的语言系统与学术规范。阿馨无疑深知这一切。但她仍

以她的坚韧、执拗加入了这一文化战场。一如她从不渲染自己丰满的人生经验与阅历，她也绝不张扬她的学术背景与优势。相反，她尊重仿效导师严谨、扎实的求知治学之道，正视、甚至夸张了她自己大陆生活经验与政治、文化经验的匮乏。于是，她大量选修各类课程的同时，阅读了数量浩繁的当代中国的文学与文化作品及资料，同时大量精读了欧美学术理论论著的原文。阿馨开始了她的新的学术生涯，不是作为一次新人生历险与征服，而是再次倾全部身心投入了一次新的探索与追求。不久，我们便开始在各类学术刊物的女性主义、或非女性主义的栏目中看到了她别具慧眼的论文。

在这本《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中，女性主义批评无疑是其中最为显著的特点。但其中的女性主义，不是一种先在的预设，理论的俯瞰，而是在深刻的体认、细致的分析、翔实材料中呈现出女性的立场与视点。在阿馨平实、细腻的文风中，突出的不是论战色彩与雄辩的风格——一如人们对一个女性主义学者的想象，而是一份娓娓道来的从容、一篇篇以理服人的陈述。或许最能显示阿馨此阶段学术风格的，是她的长篇论文《当代“十七年”小说的叙事话语与性别》。其中，她引入了当代西方文论中的叙事学、话语研究和性别分析理论，显示了她严谨的治学态度与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更有价值的是，她以这些理论为激发点，将其细致地、创造性地应用于“十七年”中国当代小说之中，在详尽、深入的文本读解的基础上，揭示出写作者的不同性别如何在叙事话语中呈现出微妙的差异。作为一个“男女都一样”的特定时代的文本生产，作为一个激越的“大时代”同声合唱的“不

同声部”，阿馨并不试图依据任何先在的预设，从中发现类似于“性沟”或女性话语式的表述；相反，她是在对大量不同文本的分析、比较之中，发现在叙述者位置、叙事语调、叙述权威、叙事视点中男女作家作品中潜隐的性别倾向与性别痕迹。其中作者与性别同时浮现出“中性”文本的疆界、陷阱与囚牢。因此，阿馨将她的分析置于远为深广的特定社会语境中。更富于启示的是，她在对作家杨沫与孙犁的比较中，进一步确认了一种“跨性别视点”。这与她对凌叔华与丁西林之《酒后》的比较分析相映成趣（见《两性写作与女性在文本中的命运》）。它向我们表明，“女性写作”，并非仅仅基于一种生理差异或曰本质论的文化宿命，而是一种叙事立场与位置的选择，一种关于性别与权力关系的反省与自觉。阿馨的论文向我们提示出“十七年”这一特定的时代及社会文化语境，在一个“妇女解放”、否定性别差异的主流话语之下，男性规范无疑是其中至为有力的权威。她对“女英雄形象与男性修辞”的分析成了一个有力的提示与说明。但在大部分“化妆为男人”写作的女作家作品中，性别间的权力关系，仍作为强有力的压抑机制在其间运作；而女作家的写作在认同、彷徨、微弱的拒斥之间，仍间或显露出性别写作的印痕，自觉或不自觉地构成了一个不甚清晰的女性的文化边缘。

事实上，正是这种坚实的理论基础、纤毫毕现的文本分析、隐忍而热切的女性的社会情怀，成就这一著作中阿馨的女性写作风格。其中另外两篇引人瞩目的论文，是《“夏娃”与“圣母”的祭献——曹禺戏剧中的女性》和《一种反控制的叙述——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前者从女性的“原型形象”入手，剖析了女性形象在男性作家写作中的文化地位。“她”更多地是作为“空洞

的能指”，用以填充男性艺术家的生命体验、历史指认与艺术想像；后者则在更为丰富的文本及其文化层面上，剖析了王安忆小说远为繁复的多重自指、内省中的“反控制叙述”，一种对男性经典话语及写作方式的颠覆与消解。

兴奋地通读了阿馨的文稿，再一次为汉语写作中女性主义批评的深入与渐趋成熟而鼓舞。一种真正的理论的女性写作形态正在成形之中。如何将属于女性的、属于个人的生命体验融入理论的写作之中？如何使一种女性主义的视点不仅仅是一种“理性”立场、一种痕迹？如何在接受他人/男性的学术规范、使用他人/男性的话语中实现“反控制的叙述”？我愿与阿馨共勉。

1994年5月8日

# 目 录

|          |        |
|----------|--------|
| 序一 ..... | 谢 冕(1) |
| 序二 ..... | 戴锦华(5) |

|                          |     |
|--------------------------|-----|
| 前言 女性主义批评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 | (1) |
|--------------------------|-----|

|                            |      |
|----------------------------|------|
| 第一编 当代“十七年”小说叙事话语与性别 ..... | (31) |
|----------------------------|------|

1. 叙事话语与性别的理论与研究 .....
2. 叙述、权威与性别 .....
3. 视点中的性别倾向 .....
4. 女英雄形象与男性修辞 .....
5. 总结：“十七年”小说的性别话语特质和含义 .....

|                       |       |
|-----------------------|-------|
| 第二编 女性主义批评与文本解读 ..... | (119) |
|-----------------------|-------|

1. “夏娃”与“圣母”的祭献 .....
2. “恶婆娘”与“好女儿” .....
3. 两性写作与女性在文本中的命运 .....

4. 一种反控制的叙述 ..... (153)  
——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
5. 女性觉醒与姐妹情谊的疑虑 ..... (164)  
——王安忆《弟兄们》的叙事

### 第三编 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与现象阐释

1.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走向与文学史观念的变迁 ..... (175)
2. 文学与宗教关系的三层次 ..... (191)
3. 反思、建构与解构 ..... (205)  
——论史铁生的精神历程
4. 老桥的沉思与对话 ..... (227)  
——批评家黄子平的批评意识
5. 从“作者—作用”看“文革”中浩然的样板小说 ..... (241)
6. 当代诗歌“戏剧化”现象 ..... (255)

附录一 女性的回应 ..... (276)

附录二 一份迟来的缘分 ..... (281)

——我如何走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之路

后 记 ..... (288)

参考书目 ..... (293)

人名索引 ..... (301)

## 前言 女性主义批评与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中国当代文学是非常广泛和复杂的一门学科或研究对象，任何研究者必须选择一个较为适合自己的兴趣、所长和力能所及的范畴、角度、方法切入文本和进行理论概括。由于我的阅读积累、背景和性别，这几年我选择了叙事性较强的文学样式：小说、戏剧和叙事诗作为我主要的研究对象，而更为明显的，我选择了性别这个角度和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大致可以概括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性别”作为一个角度或立场并不是生理意义上的性别（sex），而是社会意义上的性别（gender），也就是说，这种角度并非自然而然地出自女性（female）或男性（male），而是出自对性别的自觉，这自觉包括对自身生理性别的认知和社会界定的性别行为、角色的反思，作为社会的产物的女人（woman）和男人（man），都可以通过这种认知和反思调整自己的性别视角。由于我在开始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之前，已经经历过这样的认知和反思过程，当面对当代叙事话语的性别问题时，我的选择是很“自然”的。

女性主义批评在文学中的实践，对我来说是一个新课题，在九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亦是一个新的现象，因此，借助西方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是必须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西方妇女运